

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租金与经济增长： 一个思想史的考察^{*}

余 超^{**}

【摘 要】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角,系统地考察了租金影响经济增长的思想史。马克思在构建再生产模型时,由于没有考虑到帝国主义租金的国际转移以及国内租金的生产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因此存在两个理论“缺环”。帝国主义理论和不发达理论分析了帝国主义租金对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异质性作用,从而在第一个维度上实现了“补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了租金的生产性投资实现社会主义经济战略赶超,城市政治经济学阐释了房地产金融化引起资本主义经济衰退,从而在第二个维度上实现了“补环”。上述理论观点深化了再生产理论与租金理论之间的联系,不仅连通了《资本论》第二卷与《资本论》第三卷,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马克思六册计划的部分内容,从而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

【关键词】租金;帝国主义理论;不发达理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城市政治经济学

一、引言

从经济思想史的视角来看,古典经济学最早明确地将雇佣劳动者、资本家、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租金对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作用机制研究”(批准号:24CJL001)的阶段性成果。

^{**} 余超,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E-mail: yuchao2023@whu.edu.cn。

引文格式: 余超. 2025. 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租金与经济增长:一个思想史的考察[J]. 政治经济学季刊, 4(4): 134-159.

Cite this article: YU C. 2025. Rent and economic growth from a Marxist perspective: An examina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ought[J]. *Political Economy Quarterly*, 4(4): 134-159. (in Chinese)

土地所有者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三大阶级,将工资、利润、地租视为三种主要收入形式(陈岱孙,2014)。马克思批判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观点,他在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及上述三种收入形式的本质。他指出,工资的本质是劳动力的价值,工资的作用在于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它是社会总劳动时间中的必要劳动时间部分;利润和地租是社会总劳动时间扣除必要劳动时间之后的余额,它们是剩余劳动时间即剩余价值的具体表现形式。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从封建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利润和地租在总剩余价值分配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现在,剩余价值的正常形式已经不是地租,而是利润,地租已经不是剩余价值一般在特殊情况下独立化的形式,而只是剩余价值的一个分支即超额利润在特殊情况下独立化的形式”(马克思和恩格斯,2009a,p. 904)。

在《资本论》的理论体系中,资本家的利润被视作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它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中的作用得到了详细分析。在《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二卷中,马克思剖析了工资和利润在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中的对抗性分配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2009b, pp. 271-272),并借助再生产模型考察了这种分配关系对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2009c, pp. 474-478)。与此同时,地租仅仅作为剩余价值的一种特殊形式,它与商业利润、利息一道出现在《资本论》第三卷,成为资本主义分配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地租在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尤其是正面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论分析。这种理论缺失的源头,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六册写作计划的未完成状态。《资本论》实际上主要研究了六册计划的第一册——《资本》册中的“资本一般”规律,《资本论》第三卷的地租篇也是在分析资本一般性质的限度内考察地租。地租及其表现的土地所有制的各种历史形式、地租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等内容,要在六册计划的第二册——《土地所有制》册才能得到系统研究(汤在新,1992)。令人感到遗憾的是,马克思本人并未完成《土地所有制》册的写作。

虽然马克思本人没有来得及构建地租影响经济增长的一般性理论,但是他的地租理论和经济增长模型提供了研究这一问题的基础理论与分析工具。近年来,有学者运用马克思的地租理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和再生产模型,研究了租金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余超,2022,2023);结合中国竞争性地方政府的制度形式,分析了租金的生产性使用对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作用(孟捷和吴丰华,2020);借鉴法国调节学派和美国积累社会结构学派理论,考察了一定土地制度安排之下地租的形成过程与积累体制、调节方式、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相互关联,并且指出不同社会形态下地租对资本积累的作用经历了由负转正的历史性变化(谢地等,2023)。这些研究揭示了租金

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机制,深化了我们对于两者关系的认识。

本文将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的视角考察租金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从而进一步推进租金影响经济增长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文章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介绍马克思关于租金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充分肯定其理论具有奠定科学分析框架的重要意义,并指出他在构建再生产模型时没有考虑帝国主义租金的国际转移以及国内租金的生产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从而存在两个理论“缺环”;第三节和第四节分别阐述帝国主义理论和不发达理论关于帝国主义租金影响经济增长的相关分析,从而在第一个维度上实现了“补环”;第五节阐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租金的生产性投资与社会主义经济战略赶超的相关研究;第六节论述城市政治经济学关于房地产金融化引起资本主义经济衰退的观点,从而在第二个维度上实现了“补环”;第七节总结全文。

二、马克思关于租金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及其缺环

马克思的租金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是我们分析租金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基础性理论,也是我们围绕这一议题展开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出发点。

马克思的租金理论集中体现于对地租的分析。他认为地租是剩余价值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地租与商业利润、银行利息等收入形式共同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过程。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对地租的概念、形成原因及其本质进行了系统阐述,他认为地租是农业资本家为了获得土地使用权而支付给地主的款项,土地的自然禀赋(肥沃程度、区位、特殊品质)以及土地上使用资本的方式(资本有机构成、同一地块追加投资)会造成农产品的个别生产价格或者市场价格偏离其社会生产价格,从而产生超过平均利润的利润——超额利润,由于存在土地所有权垄断和土地经营权垄断,这些超额利润被制度化而得以持续存在,最终转化为地租(马克思和恩格斯,2009a, pp. 693-883)。在资本主义初期阶段,土地私有制是基础性的经济制度,地租是租金的典型形式。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不断发展,涌现出许多不同形式的租金,例如在知识产权制度、歧视性信贷制度条件下的超额利润分别形成了技术租金和金融租金(Harvey, 2018; 齐昊和问严锴, 2021),在生产和流通环节的国际垄断制度条件下的超额利润形成了帝国主义租金(Amin, 2012; Higginbottom, 2014)。因此,我们可以总结出一般性的马克思主义租金概念:租金是为了使用某种稀缺性要素或产品而支付给其所有者或供给者的款项,它的形成原因是特定制度所造成的垄断,其本质是一种制度化的超额利润。

在经济增长理论史上,马克思最早系统地建立了科学的经济增长理论,他

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就是经济增长理论(吴易风,2007)。根据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模型,资本家的生产性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经济增长率等于资本家的剩余积累率乘以利润率,即 $g = \alpha r$ (赵峰,2004)。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再生产模型建立在资本家利润作为剩余价值一般形式这一重要理论基础之上,因而在模型中抽象掉了作为剩余价值特殊形式的地租(或租金)变量。在马克思的再生产模型中,资本家获得所有的剩余价值并进行资本积累。然而现实的情况是,租金获得者(包括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经济主体)同样会参与剩余价值分配并进行资本积累。租金获得者与利润获得者的投资倾向通常并不一致,所以经济增长的实际情况比马克思的再生产模型更为复杂。在考虑租金变量的条件下,马克思的再生产模型存在如下两个“缺环”。

缺环一:马克思的再生产模型建立在封闭经济的假设条件下,没有考察帝国主义租金的国际转移与资本积累对不同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可以将马克思的再生产模型拓展至开放经济条件下,将世界上的国家分为两类,即帝国主义租金流入的国家和帝国主义租金流出的国家,由此构建帝国主义租金嵌入的再生产模型^①:

$$\begin{aligned} Y_{nt} &= C_{nt} + V_{nt} + M_{nt} + IR_t \\ Y_{st} &= C_{st} + V_{st} + M_{st} - IR_t \end{aligned} \quad (1)$$

其中, Y_n 、 Y_s 分别表示帝国主义租金流入国的总产值、帝国主义租金流出国的总产值, IR 表示帝国主义租金。在第 t 期,这两类国家的追加投资为:

$$\begin{aligned} I_{nt} &= \alpha_{nt} (M_{nt} + IR_t) \\ I_{st} &= \alpha_{st} (M_{st} - IR_t) \end{aligned} \quad (2)$$

假设在一段时间内,帝国主义租金的影响因素相对稳定,两类国家每期都从外部流入或向外部流出固定数量的帝国主义租金 IR , 因而 $IR = IR_t = IR_{t+1}$ 。由此可以计算出两类国家的均衡增长率:

$$\begin{aligned} g_n &= \alpha_n r + \frac{\alpha_n \cdot r \cdot IR}{(1+r)M_{nt} + r \cdot IR} \\ g_s &= \alpha_s r - \frac{\alpha_s \cdot r \cdot IR}{(1+r)M_{st} - r \cdot IR} \end{aligned} \quad (3)$$

相较于封闭经济条件下的国民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帝国主义租金的流入会使流入国进入高水平、高均衡增长的发展阶段,而帝国主义租金的流出则会使流出国陷入低水平、低均衡增长的困境。

缺环二:马克思的再生产模型假设国内资本家获得所有剩余价值并进行资本积累,而没有考虑国内租金获得者参与剩余价值分配并进行资本积累对经济

^① 更详细的模型论证可以参见余超(2022,2023)。

增长的影响。在封闭经济的假设条件下,我们可以构建租金嵌入的再生产模型^①:

$$Y_{it} = C_{it} + V_{it} + S_{it} + R_{it} \quad (4)$$

其中, S 、 R 分别是利润和租金。此时经济中的剩余价值总量 $M_t = S_t + R_t$, 租金占总剩余价值的比例记为 h (简称为抽租率)。资本所有者和租金获得者将他们所获得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用于资本积累,由此可以得到两部类的追加投资:

$$I_{it} = \alpha_i S_{it} + \beta_i R_{it} = \Delta C_{it} + \Delta V_{it} \quad (5)$$

其中, α 表示利润中用于资本积累的份额(简称为利润积累率), β 表示租金中用于资本积累的份额(简称为租金积累率)。由此可以得到两部类产值的均衡增长率:

$$g_i = \frac{Y_{it+1} - Y_{it}}{Y_{it}} = \alpha_i(1-h)r + \beta_i hr \quad (6)$$

通过进一步考察等式(6)中参数值的不同情况,我们可以得到分析租金影响经济增长的不同模型:

$$\text{标准再生产模型: } \alpha_i = \beta_i > 0 \text{ 或 } h = 0 \quad (7)$$

$$\text{租金零积累模型: } \beta_i = 0; h > 0 \quad (8)$$

$$\text{租金高积累模型: } \beta_i > \alpha_i \geq 0; h > 0 \quad (9)$$

$$\text{租金低积累模型: } 0 < \beta_i < \alpha_i; h > 0 \quad (10)$$

根据等式(7),利润积累率与租金积累率相等或者抽租率为零,这两种情况的结果是相同的,最后都得到统一的总剩余价值积累率 α_i ,马克思的再生产模型关于资本家得到全部剩余价值并进行积累的假设符合这种情况,我们将该模型命名为“标准再生产模型”。根据等式(8),抽租率大于零,但是租金完全没有用于资本积累,我们将该模型命名为“租金零积累模型”。根据等式(9),租金积累率高于利润积累率,我们将该模型命名为“租金高积累模型”。根据等式(10),租金积累率低于利润积累率,我们将该模型命名为“租金低积累模型”。从这四种模型均衡增长率的大小来看,租金高积累模型的均衡增长率最高,标准再生产模型的均衡增长率较高,租金低积累模型和租金零积累模型的均衡增长率较低。由上述四种租金积累模型可知,马克思的标准再生产模型仅代表其中一种租金积累的经济增长模式,而没有反映其他几种租金积累的经济增长模式。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阐述了地租完全被浪费于非生产性用途,从而实际上阐述了租金零积累模型。马克思指出,利润这种分配形

^① 更详细的模型论证可以参见余超(2022,2023)。

式受到资本竞争规律的限制,大部分利润必须投入再生产过程,而“至于地租,它能够表现为只是分配的形式,因为土地所有权本身在生产过程本身不执行职能,至少不执行正常的职能”(马克思和恩格斯,2009a,p. 999)。因此,马克思关于租金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的第二个缺环主要体现在,他没有考察租金高积累模型和租金低积累模型。

概言之,马克思奠定了租金理论与经济增长理论的科学分析框架,但是他的经济增长理论由于忽略租金因素而产生了两个理论缺环,这为后继的马克思主义者留下了理论扩展的空间。帝国主义理论和不发达理论围绕第一个缺环展开了分析,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城市政治经济学则围绕第二个缺环进行了研究。

三、帝国主义理论的补环：帝国主义租金流入与资本主义繁荣

帝国主义理论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即经典帝国主义理论阶段和新帝国主义理论阶段。这两个阶段的经济学家们基于特定时期的世界经济结构、租金榨取制度和租金榨取方式,考察了帝国主义租金流入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和银行业被少数寡头垄断、世界领土被资本主义列强瓜分殆尽,希法亭和列宁等人建立了经典帝国主义理论,他们从资本输出的角度考察了帝国主义租金流入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

鲁道夫·希法亭([1968]1994)指出,资本主义垄断使得利润从非卡特尔化产业流向卡特尔化产业,卡特尔化产业可以通过产品的垄断定价获得超额利润,而非卡特尔化产业的利润率下降。在卡特尔成员企业内部,由于产品价格按照生产成本最高的企业的生产价格制定,因此技术装备较好的企业可以持续获得具有级差地租性质的超额利润。对于卡特尔化企业而言,采用并垄断新技术不仅能够获得超额利润,而且可以避免其他企业威胁其垄断地位。然而,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产量提升会趋向于降低产品价格,为了维持垄断价格,卡特尔会关闭小的工厂,从而提高资本集中度并限制生产规模,由此导致投资的缓慢化。对于非卡特尔化企业而言,利润率的下降会削减其进一步的投资。上述两种现象最终导致的结果是,“一方面用于积累的资本力量迅速增大了,而另一方面投资的可能性却减少了。这个矛盾要求有解决的办法,这种解决办法在资本输出中找到。资本输出本身不是卡特尔化的结果,它是与资本主义发展不可分割的一种现象。但是,卡特尔化突然加剧了这个矛盾,赋予资本输出以紧迫的性质”。为了获得国内和国际市场的垄断地位、扩大资本输出,垄断资本直接通

过自身的经济力量以及间接通过使其他阶级的利益符合自身利益来获得支配国家政权的力量,从而对内实行卡特尔关税、对外实行殖民统治和武力争夺投资范围的帝国主义政策。卡特尔通过寡头协议和关税政策维持国内市场垄断地位而获得的超额利润实质上是垄断租金,通过各种殖民主义政策而获得的超额利润实质上是帝国主义租金。希法亭的上述分析可以总结为两点:第一,卡特尔为了在国内获取垄断租金,会主动限制生产规模、放缓投资;第二,卡特尔追求垄断租金的结果是资本过剩并且可能引发经济危机,依靠国家权力维持国际市场垄断地位并获取帝国主义租金成为解决经济危机、维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

列宁(2014)同样注意到了垄断造成的资本过剩,这些过剩的资本会由于追逐超额利润而流向国外,因为“只要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过剩的资本就不会用来提高本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因为这样会降低资本家的利润),而会输出国外,输出到落后的国家去,以提高利润”。由于落后国家的资本稀少,地价、工资、原料价格都比较便宜,所以它的利润率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利润率更高。为了瓜分利润,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私人垄断组织和国家垄断组织通过建立国际垄断同盟和武力征服殖民地等方式瓜分世界,帝国主义瓜分世界意味着只有少数国家可以获得垄断超额利润,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越来越依赖资本输出和以“剪息票”为生,从而导致“食利国”“高利贷国”的趋势愈加明显。帝国主义的这种寄生性并没有阻碍资本主义的快速增长,资本主义在整体上比以前发展更快,但是由于瓜分者的实力存在差异,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更不平衡。帝国主义国家依靠资本输出所持续获得超额利润实际上是帝国主义租金,列宁认为帝国主义租金的流入会促进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帝国主义呈现出一些新特征,大卫·哈维、迈克尔·赫德森、程恩富等人提出了新帝国主义理论,他们从与一般资本输出并存而又作为特征的知识产权输出、金融资产与美元输出等视角出发,分析了帝国主义租金流入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大卫·哈维([2004]2019)认为,马克思所描述的建立在掠夺、欺骗和暴力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原始时期的积累方式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帝国主义国家至今还在通过“剥夺性积累”从全球榨取贡赋,并且以这种积累方式缓解资本过剩危机。新型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通过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来掌控全球石油供应、专利技术和专卖许可、世界贸易和金融制度安排的垄断权力,进而从被拉入或主动融入资本主义发展逻辑之中的国家那里榨取垄断租金。国际垄断资本通过剥夺性积累获取租金的具体形式包括:低价收购其他国家的土地、电信、交通等领域的私有化资产;运用公司诈骗、信贷和股票操作对其他国

家进行资产剥夺(例如利用股票崩盘和公司倒闭来劫掠养老金);将便宜的国外石油投入本国的资本积累体系;通过专利技术和专卖许可从全球榨取食利者收入。掠夺性积累所获取的帝国主义租金能够帮助美国的过剩资本进行“空间—时间修复”,从而通过延迟时间和地理扩张来化解资本主义危机,顺利实现资本的扩大再生产。

迈克尔·赫德森([2003]2008)通过对二战后世界经济史的考察,揭示了美国利用金融霸权和美元霸权获取帝国主义租金以维持本国经济发展的实质,他将这种依靠货币霸权和金融霸权维持的帝国称作“超级帝国”。赫德森指出,美国在二战后凭借其债权国地位主导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创建与运行规则的制定,由此建立了金融霸权。美国通过这两个国际金融机构对欧洲和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同时对债务国附加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私有化、购买美国产品等有利于美国经济利益的要求。在鼓动发展中国家进行私有化的过程中,美国的金融资本趁机收购了能够产生垄断租金的公共服务部门和资源部门,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实质上成为国际金融资本推动的一场攫取垄断租金的运动。在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不受黄金储备约束的美元成为美国政府不劳而获地购买国外产品、进行军事支出和对外投资的有力工具。全球经济美元化使得全球经济体为美国的财政赤字、国际收支赤字融资,美国通过掌握美元信贷的创造来取得不受限制的国际收支赤字特权,进而利用这种特权持续地窃取他国资源来促进本国经济繁荣。

程恩富等(2019)认为新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由私人垄断、国家垄断发展为国际垄断的新阶段。新帝国主义的核心特征表现为:跨国垄断公司和国际金融资本控制全球价值的生产、流通、分配等各个环节,美元和知识产权输出成为国际垄断资本攫取垄断超额利润的重要手段,以七国集团、北约组织形式的“一霸数强”的国际寡头同盟称霸全球,全球资本主义呈现掠夺性、腐朽性、寄生性、过渡性和垂危性的总趋势。国际垄断资本通过控制全球生产网络和产品流通、实行跨国并购和金融投资、输出美元和知识产权等方式,获取了劳动套利、股息红利、特许权使用费和许可收费、国际货币铸币税等多种形式的垄断超额利润,从全球榨取了大规模的帝国主义租金。世界范围的资本积累和租金攫取,促进了美国经济尤其是虚拟经济的空前繁荣。

从上述经济思想史的观点梳理可知,帝国主义理论分析了帝国主义租金流入与资本积累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此过程中,私人垄断组织、国家垄断组织和国际垄断同盟、殖民统治制度、专利技术和专卖许可制度、不平等的国际贸易和金融制度等多种制度形式维持了租金榨取关系与物质基础的再生产,由此持续获得的帝国主义租金推动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

长。从租金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视角来看,帝国主义理论部分地填补了马克思关于租金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的第一个缺环。但是,列宁等人没有考虑落后地区的经济结构及其与帝国主义国家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从而缺乏一个系统的不发达经济理论(霍华德和金,[1992]2003)。从世界体系的角度来讲,帝国主义理论是存在缺憾的,它无法全面地分析帝国主义租金对处于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而不发达理论恰好弥补了这一缺憾。

四、不发达理论的补环:租金榨取的双重结构与不发达国家衰败

二战结束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经济落后国家通过民族解放运动摆脱了西方国家的殖民统治,但是这些国家并没有实现经济发展。巴兰等人提出的不发达理论认为:一方面,非殖民化并没有消除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剥削,发达国家可以通过对外投资、国际贸易、经济援助等方式从不发达国家手中获得巨额租金,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面临着不平等世界体系的结构性质限制;另一方面,不发达国家囿于国内政治经济结构,本国生产的大量价值不仅以帝国主义租金的形式流向外国资本,而且还要以垄断租金的形式流向国内特权阶层,租金榨取的国内外双重结构造成了不发达国家的企业生产规模萎缩、国民经济持续衰败。

保罗·巴兰([1952]1984)率先对二战后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进行了理论分析,提出了关于不发达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巴兰指出,二战后落后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建立在特权的基础上,不能成功地建立西方式资本主义体制。首先,资本主义在落后国家的扩张并没有消除封建领主对本国人民的剥削,地主仍然以地租这种“古老压迫”的形式剥削人民、霸占大部分国民生产总值并将之浪费在骄奢淫逸的生活上;其次,落后国家的工商业已经被纳入资本主义垄断集团——寡头统治者的富豪伙伴——的控制之下,为了维持市场垄断地位和垄断租金水平,垄断性企业会限制产能和投资,进而导致投资机会不足,富裕的资本家还会模仿“名门望族”的奢侈生活来表明自己的社会地位,从而进一步阻碍了资本积累和企业规模的扩大;再次,投资机会不足与可供投资的资金不足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由于落后地区的企业无法完成精巧奢侈品、机器和设备、石油和金属等产品生产与销售所需的巨额资本投入,这些领域的投资都由外国资本把控,外国资本由此从落后国家获得巨额垄断租金。最终的结果是,“产生了一种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世界的劣点兼而有之的政治经济混合体,而且有效地堵塞了经济增长的一切可能性”。另外,不发达国家的

政府也无法承担改变社会有效需求结构、重新安排生产资源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任务,因为政府是土地势力和企业家势力之间在政治上妥协的产物,“这个政府之所以被建立起来,为的是保卫和支持现存的财产权和种种特权,它不可能制定一项政策来摧毁阻挡经济进步的特权并把财产及其收入用来为全社会服务”。换言之,政府为了维持既有产权及其所衍生的垄断租金,会导致宏观调控政策的失效,最终阻碍经济增长^①。巴兰认为,落后国家只有对现有的政治结构进行激烈的整顿,打破封建地主、工业保守分子和资产阶级中等阶层的联盟,最终建立社会主义体制,才能实现经济发展。总的来说,巴兰的分析表明,落后国家的内部政治经济结构和外部世界经济体系结构,共同导致了落后国家的大量财富以租金的形式浪费于非生产性用途或者向国外输出,从而造成了落后国家国民经济的持续不发达。巴兰对不发达问题的理论分析在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许多经济学家对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研究,逐渐形成了依附理论和不平等交换理论。

安德烈·弗兰克、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萨米尔·阿明等人提出的依附理论延续了巴兰的分析框架,他们分析了依附性国际关系对落后国家经济增长的制约。弗兰克([1966]1984)指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各个层级上存在链条式的“宗主—卫星”结构关系,在垄断资本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贸易与投资格局中,作为宗主国的欧美国家能够持续地从作为卫星国的拉丁美洲国家中攫取经济剩余,拉丁美洲国家内部的城市则作为“宗主”从作为“卫星”的乡村榨取经济剩余并将之输送到宗主国,卫星国的大部分甚至全部经济剩余持续地输出至宗主国,从而促进了宗主国的经济发展,造成卫星国经济的持续不发达。弗兰克认为,落后国家的不发达不是由于孤立于世界历史主流之外的旧体制和缺乏资本,而是由于不发达的卫星国和发达的宗主国过去和现在的经济关系,落后国家“不发达的发展”状态归根结底是由不平等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造成的,因此“造成不发达状态的正是造成经济发达(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的同一历史进程”。多斯桑托斯批判继承了弗兰克的观点,他认为外部剥削是造成落后国家不发达的重要原因,但是受依附性国际关系制约的内部结构才是造成落后国家不发达的主要原因(Dos Santos, 1970)。多斯桑托斯指出,二战后的不发达国家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存在“技术—工业型”依附关系。一方面,这种依附关系对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发展造成了结构性限制:首先,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发展依赖于原料和农产品等出口部门获得的外汇以购买工业部门所需投入品,这种依附关系导致落后国家需要保留传统的出口部门和贪图享乐的寡头集团统治;

^① 巴罗·巴兰的这一观点实际上已经认识到政府对垄断租金的追逐与有效率的社会产权结构之间的持久冲突,从而在某种意义上与新制度经济学“诺思悖论”的理论内核达成了一致。关于“诺思悖论”的理论观点,参见道格拉斯·诺思([1981]1994)。

其次,不发达国家的产业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国际收支赤字的限制,由于国际贸易市场的高度垄断(发达国家以垄断低价进口初级产品、以垄断高价出口工业品)、外国资本控制最有活力的经济部门、外国援助采取贷款和购买进口工业品的形式等,大量经济剩余以垄断超额利润的形式流向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在这种不平等的国际贸易和投资结构中出现巨额逆差,从而不具备进口工业化所需物资的能力;最后,发达国家通过垄断技术和专利,向不发达国家收取垄断租金并进行工业品产业投资,导致落后国家的工业部门被外资垄断,大量产业利润流向了发达国家。另一方面,这种依附关系对落后国家的生产体系产生了重要影响:落后国家内部形成了“城市”中心和“落后地区”外围的结构,受外国资本利益支配的产业和技术结构,以及资本高度集中和收入不平等的生产结构,从而造成落后国家的劳动力遭受超级剥削、国内市场需求不足,最终导致落后国家的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陷入困境。萨米尔·阿明同样分析了依附关系所造成的经济后果,并指出中心国家可以通过垄断先进技术和世界范围内的物质资源、控制金融体系等方式从外围国家汲取超额利润,获得帝国主义租金。帝国主义租金的存在,会增加核心地区的利润并损害外围地区的利益,从而进一步加剧全球经济失衡(Amin,2012)。总结上文,依附理论认为依附性国际关系所产生的国际结构和落后国家内部结构,会导致落后国家生产的大量价值不仅以帝国主义租金的形式流向外国资本,而且以垄断租金的形式流向国内特权阶层,落后国家最终陷入经济持续不发达的境地。

阿吉里·伊曼纽尔、厄尔奈斯特·曼德尔等人提出了不平等交换理论,从国际贸易中的价值转移视角分析了帝国主义租金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影响。伊曼纽尔([1972]1988)的分析立足于两个关键假设:第一,资本在国际上可以自由流动;第二,劳动力在国际上不能自由流动。第一个假设会导致利润率的国际均等化并形成国际生产价格,而第二个假设会导致价值通过国际贸易从具有廉价劳动力的不发达国家转移到工资较高的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用较少劳动量生产的产品换取不发达国家用较大劳动量生产的产品,从而出现了不平等交换,发达国家通过不平等交换从不发达国家获取大量剩余价值,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也随之进一步扩大。曼德尔同样将不平等交换定义为不同国家商品内含劳动量的不等价交换,只不过他认为不等价交换建立在劳动生产力与利润率的国际差异基础上,而不是伊曼纽尔所称的建立在工资率的国际差异与利润率国际均等化基础之上(Mandel,1999)^①。曼德尔认为国际范

^① 其他学者同样指出,国际生产价格和平均利润率的形成面临众多阻碍,伊曼纽尔假设利润率在世界范围内可以实现平均化,这违背了马克思关于国际贸易中会形成超额利润的观点,从而导致国际价值转移途径的缺失,参见齐昊(2008)。

国内的利润率均等化面临诸多障碍,因此当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征服并统一了世界市场之后,并没有创造出一个国际生产价格的统一体系,而是创造了一种具有不同国别生产价格和统一世界市场价格的差异化体系。这种价格体系的差异源于劳动生产力水平的国际等级化和差异化,发达国家的生产技术先进、资本有机构成较高,它们的商品可以按照高于其国别生产价格的国际市场价格出售并由此获得超额利润,不发达国家则在国际贸易中遭受价值损失。曼德尔进一步指出,通过不平等交换获取的超额利润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具有固定化和永久化发展的趋势。一方面,资本的积累和扩大再生产过程取决于其对超额利润的追逐,发达国家的资本获取超额利润的一个重要来源是通过不平等交换从不发达国家和地区获得剩余价值转移,因为不平等交换需要建立在劳动生产力水平的国际差异化结构的基础上,所以资本主义虽然将世界市场的商品流通普遍化了,但是没有将商品生产普遍化,从而导致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生产缺乏同质性(lack of homogeneity)。换言之,发达国家的企业和部门可以凭借其对先进生产技术的垄断,从技术落后的欠发达国家企业和部门那里持续获得级差租金。另一方面,资本的国际集中呈现出长期发展趋势,跨国公司成为具有决定意义的组织形式,跨国公司的母公司和分布全球的子公司在原材料、劳动力和土地的购买环节以及最终产品的销售环节通过对外制定垄断价格、对内实行划拨价格的方式获取垄断租金。因此,曼德尔实际上认识到国际不平等交换中存在级差租金和垄断租金两种形式的国际价值转移(见图1)。通过对历史数据的分析,曼德尔发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剥削不发达国家的主要方式在二战后发生了重要变化,通过资本输出在殖民地获取超额利润成为一种次要方式,而不平等交换开始成为获取超额利润的主要方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不发达国家榨取租金的方式变得更加隐蔽,不发达国家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和可用于资本积累的资源通过国际贸易转移到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速度缓慢、国民经济持续陷入衰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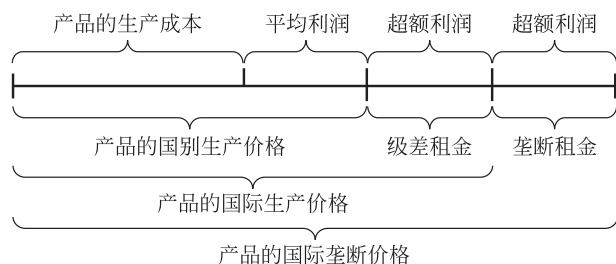


图1 国际不平等交换中的租金类型及其价值/价格构成

不同于帝国主义理论主要立足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视角,巴兰等人从世界体系的角度对不发达问题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结构和

落后国家的内部结构,共同导致落后国家的经济剩余以帝国主义租金的形式流向外国资本、以垄断租金的形式流向国内特权阶层,从而导致这些国家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面临巨大限制。也就是说,不发达理论认识到帝国主义租金对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影响是不对称的,帝国主义租金虽然会加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积累,但是同时会阻碍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造成不发达国家的持续衰败。因此,从租金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视角来看,不发达理论较为完整地填补了马克思关于租金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的第一个缺环。

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补环:租金生产性使用与战略赶超

租金不仅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它同样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并且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政府通过国有专营、产品统购统销、土地国有、产业政策等多种制度形式创造了租金,并且生产性地利用租金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实现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战略赶超目标。

20 世纪 20 年代初,苏联执行新经济政策,在无产阶级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前提下,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存,商品货币关系广泛发展,由于国内战争而受损的国民经济迅速得到恢复。随着经济建设取得初步进展,苏联经济学家围绕社会主义过渡经济时期的基本经济规律和工业化路线等理论与现实问题展开了探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1926]1984)认为,在面临外部帝国主义列强包围和内部资本主义经济威胁的背景下,力量相对较弱的社会主义工业无法在短时期内完成资金积累的任务,因此必须通过“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来加快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在过渡经济时期,依靠社会主义经济自身实现的积累(即社会主义积累)规模较小,而依靠非社会主义经济实现的积累(即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则占据着主导地位。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是指来源于国营经济综合体之外的物质积累,进行这种积累的目的在于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积累资金,积累的主要方法是在不平等交换的基础上从非国营经济中获取剩余。具体而言,国营经济在为国内的资本主义、农业小生产等非国营经济提供工业品、运输服务、银行信贷、批发或零售产品时实行价格垄断,从而获得长期超额利润并将之用于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这种依靠垄断价格获得的超额利润在苏联国有专营制度作用下,成为持续存在的垄断租金,苏联可以利用这些垄断租金实现快速工业化。20 年代末斯大林在任时期,苏联结束了新经济政策,开始全面推行计划指令型的工业化模式,在农业集体化和工商业国有化的政策背景下,以工农业剪刀差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积累以更高的速度贯彻执行,此时社会主义积累的主要方式是国

营工业通过不平等交换从集体农庄获取垄断租金以进行社会扩大再生产。虽然斯大林实行的工业化模式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理论主张不完全一样，但是斯大林的工业化方针和理论明显受到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影响，经济学家奥塔锡克甚至认为“斯大林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工业化理论的实践者”（布哈林，1981）。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国营工业部门通过不平等交换从非国营经济、集体农庄那里获得了大量垄断租金，垄断租金的生产性使用帮助苏联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战略赶超，快速地从农业大国转变为工业强国。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同样运用了“工农业剪刀差”政策来加快工业化尤其是重工业化进程，实现国民经济的战略赶超。中国的领导人和学者都对工农业剪刀差进行过研究，毛泽东认识到工农业剪刀差实质上是一种不平等交换，学者严瑞珍等人则将剪刀差定义为长期的、总体的农产品价格低于其价值、工业品价格高于其价值的不平等交换（严瑞珍等，1998）。工农业剪刀差政策的实行依赖于统购统销的产品流通制度，工农业产品不平等交换所产生的超额利润在该制度的作用下转化为持续存在的垄断租金，工业部门运用这种租金快速地实现了资金积累和产能扩张。严瑞珍等（1990）的测算结果表明，1953—1985年中国工业化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与工农业剪刀差的规模大体相等，因此这30多年间中国工业化所需投资主要来源于工农业剪刀差，工农业剪刀差奠定了中国工业现代化的初步基础。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且逐步取消了农产品统销统购制度。随着农产品多次提价，依靠工农业剪刀差进行工业化积累的作用不断下降（韩兆洲，1993）。与此同时，中国开始在城市实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和住房商品化制度。随着商业和住宅用地价格迅猛上涨，土地出让金和土地撬动的融资成为地方政府获取收入和推动城市化与工业化的重要工具（蒋省三等，2007；刘守英，2018），土地财政甚至被解释为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核心（赵燕菁，2014）。董筱丹（2015）运用马克思的总地租概念分析了中国地方经济的发展模式，她认为地方政府的目标是追求总地租的最大化，地方工业园区成功发展的原因在于将地方化的土地资产与中央化的金融资本相结合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投资，从而促进产业资本的有机构成提高和产业聚集，推升园区土地的级差地租和总地租水平，最终形成“政府以规模投资提高总地租→土地涨价规模化提取增值收益→政府再投资提高总地租”的良性循环。孟捷和吴丰华（2020）运用政治经济学理论阐释了土地财政的运行机制：在租金的来源上，地方政府通过控制商住用地数量、制定各种配套制度（例如学区房制度）等方式制造土地的稀缺性，从而提高地方政府获得的制度—垄断地租；在租

金的用途上,地方政府以低地价等各种方式补贴创新型企业、直接投资于地方国有企业的创新活动以及改善城市营建环境,从而嵌入了原本由企业之间的竞争所带来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过程,形成了中国经济特有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双重结构,从而造就较高的投资率,推动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在几乎所有行业实行了多种形式的产业政策,并由此塑造了大量垄断租金,各级政府和企业的生产性地利用租金推动了产业发展和国民经济增长。吴德荣(2010)指出,中国的租金生产过程是高度政治化和错综复杂的,它由两个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的治理逻辑所推动:一个是产业计划,一个是分权。一方面,中央政府通过制定指定产业和企业的重点扶持计划,运用全国市场的准入限制、税收优惠、限制进口等政策创造租金,分配产业和企业发展的优先权,发展大型本土企业并提升其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分权和区域竞争的驱使下要求加快本地产业发展,地方政府通过用地补贴、税收优惠、地方保护等方式创造自己的租金生产体制,扶持本地企业来竞争国家租金,从而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因此,租金的创造和分配可以被用作政策工具来引导国家和地方的产业发展,政府创造租金的能力在支持市场改革的政府代理机构之间激发了强烈的动机,推动了中国的增长。巫永平(2010)认为,中国的产业政策是典型的租金生产与分配过程,中央政府通过划分支柱性产业和非支柱性产业,运用挑选重点企业并实施准入限制、提供融资等政策为支柱性产业创造更多的垄断租金和更长时间的产业扶持。地方政府则同时作为寻租者和创租者,推动本地支柱性产业的发展:一方面,地方政府通过游说中央政府来帮助本地企业突破准入限制进而享受垄断租金,帮助本地企业成功寻租;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通过低价出让土地、税收减免、政府采购等方式为本地企业创造租金,从而推动本地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例如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央政府将汽车产业定位为支柱性产业,并且为一汽、二汽等六家重点扶持企业提供行业准入限制、进口限制等多种优惠政策,这使得中国汽车行业的利润率远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①,巨额租金的存在引发了各地政府建立并扶持本地汽车企业、游说中央政府以突破行业限制,最终出现中央政府扶持的中央直属企业(如一汽、二汽),地方政府扶持的地方国企(如上汽),以及地方民企(如吉利、奇瑞)共同竞争的局面,推动了中国汽车产量增长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实现了支柱性产业的快速发展和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

从上述经济思想史梳理可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张运用各种经济制度安排来塑造租金,进而通过租金的高积累来推动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国民经济增

^① 统计数据显示,当时国际汽车工业的平均利润率为 10% 左右,而中国汽车行业的利润率为 30%~60%,参见李春林和天舒(1998)。

长,最终实现战略赶超的目标。换言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实际上主张实行租金高积累的经济增长模式,该理论部分地填补了马克思关于租金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的第二个缺环。

六、城市政治经济学的补环：房地产金融化与资本主义经济衰退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复兴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城市矛盾日益加剧的时代背景下,地租理论在城市政治经济学领域引起了热烈关注与讨论,学者们分析了城市地租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20世纪70年代,城市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共识是遵循马克思的观点,将地主视作封建主义的残余,地租的存在会阻碍资本积累(Haila,1990;沃德和奥尔伯斯,[2016]2022)。Harvey(1974)提出了“阶级—垄断地租”的概念并将之用于分析城市问题,他认为阶级—垄断地租会吸引资本从生产性的初级资本循环转向非生产性的次级资本循环,最终导致金融投机的兴盛和价值生产的萎缩。Massey(1977)、Massey and Catalano(1978)指出现代英国经济中存在“前土地所有权”“产业土地所有权”“金融土地所有权”等各种形式的土地所有权,这些土地所有权及其衍生的地租会阻碍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其中,皇室、贵族、教会等传统地主阶级依靠“前土地所有权”获取地租收入,他们比较关注土地所有权的历史联系和社会作用,而不是仅仅将土地作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产来使用;产业资本、自耕农等阶级具有“产业土地所有权”,他们将土地所有权视作生产条件并且根据生产过程特征利用土地,但是土地经营的分散限制了大规模投资和生产力提升;房地产公司、养老基金等机构通过投资取得“金融土地所有权”,这些机构的投机活动导致城市地租和房价的持续抬升并且剧烈波动,从而不利于资本积累。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土地所有者越来越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并且对资本积累至关重要,学者们开始重新评估土地所有者和地租的作用,指出地租对经济增长具有双向作用。Scott(1980)认为地租的使用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在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土地贵族作为寄生性阶级,他们将地租浪费于非资本主义性质的支出,而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土地所有权与资本相互融合,资本主义部门可以获得地租并将之用于新增投资,从而扩大了资本积累的规模。Harvey(1982)认为城市地租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和消极的双重作用:一方面,随着商品交换范围、货币关系以及信用体系的扩张,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土地被当作一项金融资产,土地的买卖以其在未来所提供的租金为依据,

土地所有者有动力推动土地的开发模式、投资以及业务以最佳的方式进行,最终使得剩余价值生产与租金提升两者相互协调;另一方面,金融资本的逐利性会不断抬升地租,过剩的货币资本会涌向土地市场,并造成周期性的投机泛滥,最终掠夺和破坏土地上的生产活动。Krätke(1992)同样认为地租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双面性,他认为在土地所有权与资本相互融合的条件下,如果地租的提升与资本增殖过程联系在一起,那么地租的存在会直接促进资本积累;如果地租的提升仅仅依赖金融增殖,脱离了实际的生产和资本增殖过程,地租就会阻碍经济增长。

城市政治经济学在不同时代的理论观点变化,实际上反映了学者们对于城市地租在社会总资本再生产过程中作用的认识不断深化。大体而言,城市地租在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可以分为两种:一是用于非生产性的金融投机活动;二是用于生产性投资。前一种作用会阻碍资本积累,后一种作用能够促进资本积累。根据所处的经济时代背景,20世纪70年代的学者们主要强调了城市地租的第一种作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学者们则全面地分析了城市地租的双重作用。因此,城市地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会依据经济时代背景和地租所起的主要作用而发生变化。

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随着房地产金融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和食利资本主义的崛起,学者们越来越强调城市地租的非生产性作用,他们认为城市地租会引起经济衰退并且最终导致经济危机。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去金融监管、去住房租金监管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住房抵押贷款及其证券化、租赁住房支持的金融工具蓬勃发展,大量金融资本涌入土地和住房市场,资本主义国家呈现土地与住房金融化趋势(谢富胜等,2021;李连波和黄泽清,2021)。像其他不动产一样,住房能够作为一种高价值的抵押品,住房按揭贷款和住房租赁收入具有规模化、标准化、收入流稳定、核算体系与制度框架健全等优势,因此房地产成为银行、私募基金、信托等各类金融机构的投资目标,资本被住房所吸收,是现代房地产驱动的金融化积累体制的鲜明特征(Fernandez and Aalbers, 2016; Aalbers, 2017)。金融资本涌入房地产的经济动机是持续获得基于地租的收益流,由于持有土地和住房资产就可以获得对未来地租收益的索取权,土地和住房就成为一种类似于生息资本的虚拟资本。一旦金融资本的介入是为了无休无止地抬升未来地租,引起土地和住房资产的投机泛滥,就会提高债务杠杆,金融风险不断累积并最终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Harvey, 2012; 孟捷和龚剑, 2014)。在房地产部门金融化的背景下,金融机构持有大部分土地和住房的资产凭证,由此从产业资本和劳动者手中取得绝大多数地租支付,金融资本成为不劳而获的食利者,使得现代资本主义走上债务奴

役和新封建主义的道路。金融部门的食利行为最终使得实体经济无法创造经济剩余以投资于扩大再生产,资本主义经济最终不可避免地陷入经济衰退(赫德森,2010)。

总而言之,城市政治经济学认识到,城市地租的双面性作用会导致部分租金用于生产性投资、部分租金被浪费于非生产性的金融投机活动。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随着房地产金融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和食利资本主义的崛起,城市地租的非生产性投机使用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资本主义经济最终陷入租金低积累的增长模式。从经济思想史的发展脉络来看,城市政治经济学关于租金低积累的观点部分地填补了马克思关于租金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的第二个缺环。

七、结语

如图2所示,在考虑经济开放程度和租金积累速度这两个维度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完整四象限的租金影响经济增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图谱。其中,第三象限底部代表马克思的地租理论,它阐述了封闭经济条件下租金零积累的情形;第一象限代表帝国主义理论,第四象限代表不发达理论,它们分别考察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租金高积累和租金低积累的情形;第二象限代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三象限代表城市政治经济学,它们分别考察了封闭经济条件下租金高积累和租金低积累的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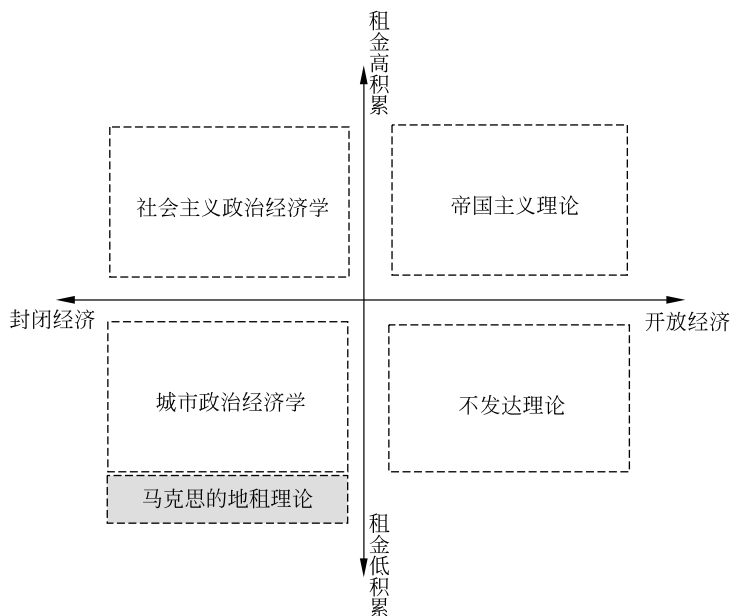


图2 租金影响经济增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图谱

本文基于经济思想史的视角,阐述了马克思关于租金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观点,总结出该理论的两个缺环,并进一步梳理了不同政治经济学流派在填补上述两个缺环方面所作的理论贡献。列宁、哈维等人提出的帝国主义理论分析了帝国主义租金的国际转移与资本积累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帝国主义租金的攫取维持了资本主义经济繁荣。巴兰等人提出的不发达政治经济学理论认为帝国主义租金会阻碍不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造成不发达国家的持续衰败。帝国主义理论和不发达政治经济学相互照应,两者共同填补了马克思关于租金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的第一个缺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主张运用各种经济制度安排来塑造租金,进而通过租金的高积累来加快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最终实现战略赶超的目标。城市政治经济学认识到,以城市地租为核心的房地产金融化造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虚拟化发展,大量租金被浪费于非生产性活动,从而陷入租金低积累的增长模式。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城市政治经济学分别阐述了租金高积累和租金低积累的增长模式,两者共同填补了马克思关于租金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的第二个缺环。

正如恩格斯所言:“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和恩格斯,2009d,p. 691)后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运用马克思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从不同角度分析了租金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他们的研究表明:租金作为剩余价值分配的一种特殊形式,它在社会总资本再生产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租金对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不同地位、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经济制度的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异质性作用。租金影响经济增长的经济思想史研究,深化了再生产理论与租金理论之间的联系,不仅连通了《资本论》第二卷与《资本论》第三卷,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马克思六册计划的部分内容,从而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 阿吉里·伊曼纽尔. 1988. 不平等交换: 对帝国主义贸易的研究[M]. 文贯中, 译. 北京: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
- (original language) EMMANUEL A. 1972. *Unequal exchange: A study of the imperialist of trade*[M].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 安德烈·弗兰克. 1984. 不发达的发展[M]//查尔斯·威尔伯. 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 高钰,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original language) FRANK A. [1966]. Underdeveloped development[J]. *Monthly Review*, 18(4): 17-31.

- 保罗·巴兰. 1984. 论落后问题的政治经济学[M]//查尔斯·威尔伯. 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 高钰,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original language) BARAN P. [1952].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backwardness[J]. *The Manchester School*, 20(1): 66-84.
- 陈岱孙. 2014. 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若干主要学说发展论略[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CHEN D S. 2014. *From the classical school of economics to Marx: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several major theories* [M].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in Chinese)
- 程恩富, 鲁保林, 俞使超. 2019. 论新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和特性——以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为基础[J]. 马克思主义研究, (5): 49-65, 159-160.
- CHENG E F, LU B L, YU S C. 2019. Five characteristics and features of neo-imperialism—An analysis based on Lenin's imperialism theory[J]. *Studies on Marxism*, (5): 49-65, 159-160. (in Chinese)
- 大卫·哈维. 2019. 新帝国主义[M]. 付克新,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original language) HARVEY D. 2004. *The New Imperialism*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道格拉斯·诺思. 1994.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 陈郁, 罗华平,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original language) NORTH D C. 1981.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 董筱丹. 2015. 再读苏南: 苏州工业园区二十年发展述要[M].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 DONG X D. 2015. *Rereading Su Nan: A summa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Suzhou industrial park in the past 20 years* [M]. Suzhou: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in Chinese)
- 韩兆洲. 1993. 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计量方法研究[J]. 统计研究, (1): 49-51.
- HAN Z Z. 1993. Research on the measurement method of scissor difference in industrial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 prices[J]. *Statistical Research*, (1): 49-51. (in Chinese)
- 蒋省三, 刘守英, 李青. 2007. 土地制度改革与国民经济成长[J]. 管理世界, (9): 1-9.
- JIANG S S, LIU S Y, LI Q. 2007. The land system reform and the growth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9): 1-9. (in

Chinese)

卡勒姆·沃德, 曼努埃尔·奥尔伯斯. 2022. “地租这个烂摊子”: 地租理论的意义何在? [J]. 政治经济学报, 22(1): 137-162.

WARD C, AALBERS M. 2022. “Virtual special issue editorial essay: ‘The shitty rent business’: What’s the point of land rent theory?”[J]. *The Chi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2(1): 137-162.

李春林, 天舒. 1998. 中国汽车产业发展问题报告[M]. 沈阳: 沈阳出版社.

LI C L, TIAN S. 1998. *Report on development issues of China’s automotive industry*[M]. Shenyang: Shenyang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李连波, 黄泽清. 2021. 住房金融化与《论住宅问题》的时代价值[J]. 当代经济研究, (4): 16-26.

LI L B, HUANG Z Q. 2021. Housing financialization and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the housing question[J]. *Contemporary Economic Research*, (4): 16-26. (in Chinese)

列宁. 2014.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60.

刘守英. 2018. 土地制度变革与经济结构转型——对中国 40 年发展经验的一个经济解释[J]. 中国土地科学, 32(1): 1-10.

LIU S Y. 2018. Land institutional reform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for China’s 40 years development experience [J]. *China Land Science*, 32(1): 1-10. (in Chinese)

鲁道夫·希法亭. 1994. 金融资本[M]. 福民,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original language) HIFERDING R. 1968. *Das finanzkapital*[M]. Frankfurt: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马克思, 恩格斯. 2009a.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7 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 恩格斯. 2009b.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 恩格斯. 2009c.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6 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 恩格斯. 2009d.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迈克尔·赫德森. 2008. 金融帝国: 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M]. 嵇飞, 林小芳,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original language) HUDSON M. 2003. *Super imperialism. The origin and*

- fundamentals of U. S. world dominance*[M]. London: Pluto Press.
- 迈克尔·赫德森. 2010. 从马克思到高盛：虚拟资本的幻想和产业的金融化（上）[J]. 国外理论动态, 2010, (9): 1-9, 71.
- HUDSON M. 2010. From Marx to Goldman Sachs: The illusion of virtual capital and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industries. *Foreign Theoretical Trends*, (9): 1-9, 71. (in Chinese)
- 迈克尔·霍华德, 约翰·金. 2003.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 1929—1990[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 (original language) HOWARD M C, KING J E. 1992. *A history of Marxian economics volume II, 1929—1990*[M]. London: Red Globe Press.
- 孟捷, 龚剑. 2014. 金融资本与“阶级—垄断地租”——哈维对资本主义都市化的制度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 (8): 91-108.
- MENG J, GONG J. 2014. Financial capital and “class monopoly land rent”——Harvey’s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f capitalist urbanization[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8): 91-108. (in Chinese)
- 孟捷, 吴丰华. 2020. 制度—垄断地租与中国地方政府竞争：一个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J]. 开放时代, (2): 160-179, 9.
- MENG J, WU F H. 2020. The institution-monopoly rent and competition between local governments in China: A marxist framework of analysis[J]. *Open Times*, (2): 160-179, 9. (in Chinese)
-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 1981. 布哈林文选中册[M]. 国际共运史研究室,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BUKHARIN N. 1981. *Selected works of Bukharin* [M].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History Research Room, trans.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 1984. 新经济学[M]. 纪涛, 蔡恺民,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 (original language) 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ИЙ. 1926. *Н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M]. Советско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 齐昊. 2008. 马克思主义的不平等交换理论与中国对外贸易的现实[J].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08(1): 64-85.
- QI H. 2008. Marxist’ theories on inequality and foreign trade of China[J].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8(1): 64-85. (in Chinese)
- 齐昊, 问严锴. 2021. 绝对地租的形成机制：理论评析与当代意义[J]. 教学与研究, (4): 44-54.
- QI H, WEN Y K. 2021.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absolute land rent:

- Theoretical evaluation and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J]. *Teaching and Research*, (4): 44-54. (in Chinese)
- 汤在新. 1992. 从经济学手稿到《资本论》[J]. 中国社会科学, (5): 95-112.
- TANG Z X. 1992. From economic manuscripts to capital[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5): 95-112. (in Chinese)
- 吴德荣. 2010. 租金的生产与中国的产业发展[M]//巫永平, 吴德荣. 寻租与中国产业发展.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WU D R. 2010. *Rent produc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China*[M]//WU Y P, WU D R. *Rent Seeking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China*.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in Chinese)
- 吴易风. 2007. 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J]. 经济研究, 42(9): 11-17, 48.
- WU Y F. 2007. Marx's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 theory[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42(9): 11-17, 48. (in Chinese)
- 巫永平. 2010. 地方政府、寻租与产业政策[M]//巫永平, 吴德荣. 寻租与中国产业发展.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WU Y P. 2010. *Local government, rent seeking, and industrial policy*[M]//WU Y P, WU D R. *Rent Seeking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China*.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in Chinese)
- 谢地, 荣莹, 叶子祺. 2023. 积累体制、调节方式与利益主体关系——马克思主义地租理论的视角[J]. 经济学动态, (8): 31-43.
- XIE D, RONG Y, YE Z Q. 2023. Accumulation systems, regulation and relations of interest subje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s theory of land rent [J]. *Economic Perspectives*, (8): 31-43. (in Chinese)
- 谢富胜, 王松, 李直. 2021.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城市地租理论: 研究进展与前景展望 [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35(6): 102-114.
- XIE F S, WANG S, LI Z. 2021. A Review of the theories on urban land rent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marxism[J]. *Journal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35(6): 102-114. (in Chinese)
- 严瑞珍, 龚道广, 周志祥, 等. 1990. 中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现状、发展趋势及对策[J]. 经济研究, (2): 64-70.
- YAN R Z, GONG D G, ZHOU Z X, et al. 1990. The current situation, development trend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price scissor gap of Chinese industrial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s[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 64-70. (in Chinese)
- 严瑞珍, 龚道广, 周志祥, 等. 1998. 中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M]. 北京: 中国

人民出版社.

YAN R Z, GONG D G, ZHOU Z X, et al. 1998. *The price scissors of industrial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China* [M].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in Chinese)

余超. 2022. 租金、制度与经济增长：一个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J]. 经济纵横, (11): 24-32.

YU C. 2022. Rent, institu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A Marxist framework of analysis[J]. *Economic Review Journal*, (11): 24-32. (in Chinese)

余超. 2023. 全球视野下的租金与经济发展——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证分析[D].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YU C. 2023. R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 global perspective—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Marxist economics[D]. Beij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in Chinese)

赵峰. 2004. 马克思的增长理论[J]. 政治经济学评论, (2): 20-48.

ZHAO F. 2004. Marx's growth theory [J]. *China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2): 20-48. (in Chinese)

赵燕菁. 2014. 土地财政：历史、逻辑与抉择[J]. 城市发展研究, 21(1): 1-13.

ZHAO Y J. 2014. Land finance in China: History, logic and choices[J].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1(1): 1-13. (in Chinese)

AALBERS M B. 2017. The variegated financialization of housing[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41(4): 542-554.

AMIN S. 2012. The surplus in monopoly capitalism and the imperialist rent[J]. *Monthly Review*, 64(3): 78.

DOS SANTOS T. 1970. The structure of dependence[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0(2): 231-236.

FERNANDEZ R, AALBERS M B. 2016. Financialization and housing: Between globalization and varieties of capitalism[J]. *Competition & Change*, 20(2): 71-88.

HAILA A. 1990. The theory of land rent at the crossroads[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8(3): 275-296.

HARVEY D. 1974. Class-monopoly rent, finance capital and the urban revolution [J]. *Regional Studies*, 8(3/4): 239-255.

HARVEY D. 1982. *The limits to capital*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ARVEY D. 2012. The urban roots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Reclaiming the city for

- anti-capitalist struggle[J]. *Socialist Register*, 48: 1-35.
- HARVEY D. 2018. *Marx, capital, and the madness of economic reason*[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IGGINBOTTOM A. 2014. ‘Imperialist rent’ in practice and theory [J]. *Globalizations*, 11(1): 23-33.
- KRÄTKE S. 1992. Urban land rent and real estate markets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restructuring: The case of Germany [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0(3): 245-264.
- MANDEL E. 1999. *Late capitalism*[M]. London: Verso.
- MASSEY D. 1977. The Analysis of Capitalist Landownership[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1/3): 404-424.
- MASSEY D B, CATALANO A. 1978. *Capital and land: Landownership by capital in great Britain*[M]. London: Edward Arnold.
- SCOTT A J. 1980. *The urban land nexus and the state*[M]. London: Pion Limited.

Rent and Economic Growth from a Marxist Perspective: An Examina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ought

YU Chao^{1,2}

(1. School of Marxism,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China;

2. Hubei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Marxist Theory and China's Practice, Wuhan, Hubei,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on how rent affects economic grow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economics. When Marx constructed the reproduction model, there were two theoretical “gaps” due to the lack of consideration for the international transfer of imperialist rent and the role of productive investment in domestic rent in economic growth. The theories of imperi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analyze the heterogeneous effects of imperialist rent on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ed and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thus achieving a “replenishment” in the first dimension.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analyzes the productive investment of rent to achieve the strategic catch-up of the socialist economy, while urban political economy interprets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real estate leads to the decline of the capitalist economy, thus achieving a “replenishment” in the second dimension. The above theoretical viewpoints have deepene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heory of reproduction and the theory of rent, not only connecting the second and third volumes of *Capital*, but also filling in some parts of Marx's six-volume plan to a certain extent, thus further improving and developing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Marxist economics.

Keywords: rent; imperialism theory; underdeveloped theory; socialism political economy; urban political economy